

◇译者序◇ 员

译者序

——修正结构主义与南北关系

摇摇南北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其前景如何？解决之道又在何处？这是战后，特别是冷战后国际政治理论界一个不容回避却又见仁见智的问题。对此，理论界的不同学派提出了各种观点，其中，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克莱斯勒的《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颇具代表性。该书论点新颖，资料翔实，论证缜密，是南北关系研究方面不多见的佳作。

一、克莱斯勒其人及其学术思想

斯蒂芬·克莱斯勒(~~斯蒂芬·克莱斯勒~~)系美国斯坦福大学格雷厄姆·斯图亚特讲席(~~斯蒂芬·克莱斯勒~~)国际关系教授，曾任著名的《国际组织》杂志编辑，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等学术机构的成员。在国际政治学界，克莱斯勒一直以不赶学术“风头”和对学科的坚定信念而著称。他曾和沃尔兹、吉尔平等学者一道，使当时遭到多方攻击的现实主义理论焕发了新的生机。他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努力也弥合了新现实主义与国际制度学派之间的对立，同时，因将现实主义的核心假定简化为国家理性行为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而获得了“准现实主义者”(~~斯蒂芬·克莱斯勒~~)的称号。当然也曾因此而遭到同行们的挖苦，认为他“巧妙地将现实主义的躯体与新现实主义的洗澡水一

圆◇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

起倒掉了”。^{〔5〕}

在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初,当克莱斯勒还是哈佛大学的学生和助教时,长期占据国际政治理论界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当时国际体系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越战、石油危机等,使得一些理论家认为国际体系正在发生着新的质变,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将取代政治权力的博弈而成为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年轻的克莱斯勒没有轻信此论,他潜心研究了决定世界经济开放性的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对特定时期世界经济总量与贸易额之间的比率、平均关税水平等要素的梳理,得出了一个在当时来说是惊人的结论:世界经济的开放性与国际体系中有无主导性大国的存在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服从于国家间政治与经济权力的分配格局。这一结论与当时金德尔伯格(悦)和詹姆斯·罗宾逊(悦)等人的研究成果一起,成了后来影响颇大的“霸权稳定论”的理论源头。

1954 年,他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发表了第一部著作——《捍卫国家利益》。^{〔6〕}在该书中,他通过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三种理论方法的比较,仔细分析了 20 世纪美国在原材料领域的对外投资行为,得出结论:国家是一个自主的实体(悦),它理性地在国际国内追求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而实在的。这本书的出版,给了当时正遭到科学行为主义冲击的现实主义学派以有力的支持。尽管他后来回忆说,该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直接捍卫现实主义或现实主义关于国际体系的分析方法,而是要证明现实主义的一个内核:国家是单一和理性的。^{〔7〕}这个内核,也成了他日后研究生涯的逻辑起点。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克莱斯勒与基欧汉(悦)和约瑟夫·奈(悦)等人同时注意到霸权国的出现与世界经济的开放性之间并不完全对应这一现象。于是,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个新的变量——

国际制度(~~孙秉山译著~~)被引入 ,并成了新的理论热点。克
莱斯勒不失时机地主编出版了《国际制度》一书 ,集当时国际制度
研究成果之大成。其对“国际制度”的定义 ,被著名国际政治理论
家凯格里(~~悦理哲云译著~~)和王逸舟先生推许为关于这一术语最
有影响力的定义 ,他本人也成为该领域的主要代表人之一。⁽¹⁾然
而 ,克莱斯勒最有影响和争议的著作还是《结构冲突 :第三世界对
抗全球自由主义》。该书首次将国际制度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
和结构主义分析法结合起来 ,分析南北关系这一当代国际政治中
的重大现实问题 ,成为 80 年代中期与基欧汉的《霸权之后》(~~粤译~~)
并列的、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冷战之后 ,克莱斯勒继续
笔耕不辍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和主权研究方面发
表了大量作品。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 ,克莱斯勒不随流俗 ,善于抓住理论研
究中的前沿课题 ,而且堪称国际政治理论与现实结合的典范 ,避免
了纯资料堆砌而无理论框架与纯理论演绎而缺实证分析两种倾
向。这两个特点都鲜明地体现在本书当中。

二、关于南北关系研究的方法论

对南北关系的传统分析方法主要有两种 :经济解释法(~~薄译~~)
和权力解释法(~~袁译~~)。从经济解释法
来看 ,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政治行为受提高本国社会福利水平的
愿望所驱动 ,实现财富最大化是他们的根本目标。发展中国家经
济上的繁荣将会给富国和穷国都带来好处 ,南北间存在的矛盾将
会随着发展中国家物质条件的改善而得以缓解。权力解释法(或
传统现实主义)把国家看成国际体系中基本的行为体 ,其他行为
体 ,如多国公司和国际组织 ,都要受到国家及其权力的制约与规

源◇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

范,它们的行为动机与任何无政府状态下的行为体一样,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博弈。制度几乎没有什么自主性,它们只是权力组合下的一个小小的变体。当国家权力发生变化时,制度也随之变化。

克莱斯勒则独辟蹊径,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分析视角——修正结构主义(或修正现实主义)。这一视角充分利用了国家权力(或国家利益)和国际制度(或国际规范)两个概念:一方面承认政治权力在制度创建中的重要性,认为除非得到体系中强国的支持,不可能建立起持久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另一方面也认为制度一旦确立,它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松弛起来,业已确立的制度会由于高昂的破坏代价和缺乏替代选择等原因而产生存在下去的惯性。国际组织内部的影响力分配并不一定反映构成其基础的国家间权力分配状况,一国一票制的决策程序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因而,制度并不一定与构成其基础的权力分配格局的变化同步,它还会受到制度本身的开放程度与理论思潮等因素的影响。从修正结构主义角度考虑,制度自主性的规范含义取决于权力分配格局与制度特征的非相合性。一定程度上的非相合性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有帮助的。这可使制度有足够的寿命和稳定性来产生对双方都有益的结果。然而,这种不一致越大,制度崩溃的可能性就越大。

具体到南北关系而言,修正结构主义提出了一套独特的解释。从分析性理论视角看,其基本观点是,在涉及全球制度的国际论坛中,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行为动机是通过支持使“主权平等”这一理念合法化的原则、规范和规则,来减轻它们所面临的脆弱性。从解释性的理论视角看,世界就是由追求安全与控制最大化的国家组成的,不安全是一个无时无刻不在的因素。从描述性的角度看,修正结构主义认为南北冲突是根深蒂固的,南方国家的脆弱性将会

长期存在下去。对北方世界而言,最审慎的政策就是限制国际制度的成员国范围,鼓励南方世界集体自立程度的提高。

尽管克莱斯勒用了大量篇幅来论证其方法论的有效性和相对于“经济决定论”(这是克莱斯勒对相互依存理论、各种自由主义与人类基本需要学说(丹霍伊厄森、托克曼、托克曼的统称))的优越性,并做了大量的个案研究,但他的这种方法论还是有大大可置疑之处。首先,克莱斯勒自称借用了沃尔兹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但在实际应用中却只出现了体系层次和国家层次两个“想象”,而没有对国家内部决策层次的分析;其次,从各种新马克思主义和相互依存论等其他分析视角看,南北关系本质上是经济关系,政治冲突只是后果而非原因;最后,克莱斯勒认为在南北关系中,国家对财富的追求会让位于对权力的追求,经济因素必然服从于政治因素。但财富与权力、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真能截然分开吗?关于这一点,另一位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吉尔平(约瑟夫·奈)的说法也许更为中肯:“要明确找出国际冲突的‘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是不切实际的。正在实践的政治动机只能用经济来表达,每一种冲突都是权力的冲突,而权力则依赖于人力、物力和财力’”。^(续)

三、关于南北关系的实质与发展中国家的追求目标

南北冲突的实质是什么?与国际体系内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相比较,发展中国家有没有自己独特的追求目标?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本书最精彩之处。克莱斯勒通过对南北关系史的仔细梳理,发现了两个有趣的事实,对关于南北关系的两个传统看法提出了挑战。

一种传统观念认为,南北关系的焦点在于发展中国家的落后状态,发展中国家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是对其经济状况不佳的

远◇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

反应。克萊斯勒却发现,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无论相对于其历史上的表现还是相对于北方国家同期的发展状况,都是很快的。而且,在战后自由秩序下,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中国家其发展速度快于北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都不错,其中石油出口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尤为突出。更为有趣的是,在 1946 年代和 1950 年代,在发展中国家提出国际新秩序倡议,最激烈地反对自由国际秩序之时,正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表现最佳的时期。另一种传统观念则认为,在整个冷战时期,南北关系服从于东西方冷战的格局之下,并没有独立的价值。对此,克萊斯勒分析了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谈判情况。1958 年和 1960 年的两次会议完全由当时的东西对峙格局所主导,但到了第三次会议时,南北对立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发展中国家所极力促成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给发达国家带来的收益却远远大于其自身所得。

据此,克萊斯勒提出了两对核心概念:权威分配模式(权威分配模式)与市场导向分配模式(市场导向分配模式),变位权力行为(变位权力行为)与联系权力行为(联系权力行为)。权威分配模式指通过政治权威直接或间接分配资源,而市场导向分配模式则指资源的分配是通过个体的能力和偏好,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得以体现。联系权力行为指在承认既定秩序的前提下寻求价值最大化的努力,而变位权力行为则指以改变秩序本身为目的的努力。

如果全球经济实行市场导向分配模式,则可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各参与行为体都可从中获取福利。然而,由于市场资本主义本质上的不稳定性,必然会给脆弱的一方带来损害。作为理性行为体,弱势一方必然地倾向于较为稳定的权威分配模式,而强势一方则青睐市场导向分配模式。在南北关系中,南方世界追求权威分配模式,而北方则倾向于市场导向分配模式。对发展中国家而

言,如果仅仅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着眼于弥合南北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就会在承认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前提下,遵守市场导向分配原则,奉行联系权力行为,追求财富最大化这一国家目标。如果为了追求政治影响,谋求消除自身在国内国际两个层面上的脆弱性,就会奉行变位权力行为,努力使国际制度中体现出更多的权威导向色彩,追求控制最大化这一国家目标。

不言而喻,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是后一种战略。当前国际体系的主导秩序是战后在美国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以市场导向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霸权)。因而,南北关系的实质,就表现为国际经济新秩序(霸权)与自由国际经济秩序之争。发展中国家的追求目标,既可能是财富,也可能是政治控制,但如果两者发生冲突,就会为了控制而牺牲财富,奉行变位权力战略,追求控制的最大化。这可证之于发展中国家在石油危机和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的表现。但这两个结论,似乎并未被东亚金融危机后各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所证明,也与全球化浪潮下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战略选择有异。

四、关于南北关系的前景和可能的解决途径

关于南北关系的前景,克莱斯勒是很悲观的。在这一点上,他虽与世界体系论和依附论等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起点不同,却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南北冲突的根源是结构性的,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善。但他也有几点独具特色的创见:其一是关于产生这种可能性的根源,克莱斯勒认为,既有国际权力分配格局所决定的结构因素,也有发展中国家内部体制结构的原因,如社会结构僵化、政治体制虚弱和财税能力低下等,它们不会因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改善而完全消除。其二是关于发展中国家在自由国

愿◇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

际经济秩序下的地位,并不会像新马克思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宿命地处于绝对不断恶化的边缘,而是在特定的内外环境下,也会有相对改善,如新兴工业化国家(暹罗)和石油出口国的情况。但作为一个整体的第三世界,要想改变其相对地位,仍是难以想象的。这与著名经济学家里昂惕夫的预测是相符的,也与其后南北间经济发展现实相一致。⁽¹⁰⁾其三,克莱斯勒认为,即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获得相当程度的发展,也不会消除南北间的结构性对立。这是因为经济的发展并不会必然带来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根本改善,也不会彻底弥合南北间历史所造成的鸿沟。

当然,克莱斯勒不是一个悲观的宿命论者。他认为,南北间制度维持与合作的前景虽不乐观,南北间的结构冲突不会彻底消失,但有三种发展趋势可能会缓和这种紧张关系。第一,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会获得足以应付当前国际体系冲击的国家权力能力(这种能力是相对于国家本身而言的),从而决定性地减缓国内结构上的脆弱性。这里分三种情况:一种是有些国家凭本身的规模,即可对付源自国际体系层次上的压力,如中国和印度;其次是一些国家拥有某些特定的资源,可以有效地介入国际市场,如石油出口国家;第三种最具普遍意义,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出了一套灵活而成熟的国内机制结构,能够对国际体系层次上的变化做出及时有效的调整,如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这三种国家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支持态度没那么激烈。

第二点饶有趣味,这位国际制度研究的开先河者认为,国际制度,特别是当前国际组织的衰落,是缓和南北间紧张关系的必要条件。因为在克莱斯勒看来,主权平等原则的合法化与国际制度内一国一票制决策程序的确立,使发展中国家获得了超出其本身国家权力能力的手段,从而破坏了这些国际制度所赖以建立的国家间权力分配格局。用他的术语来说,就是国家权力分配格局与国

◇译者序◇ 怨

际制度的决策程序出现了“非相合性”(非对称性),最后会走向动态的不稳定(动态平衡)。他认为,如果没有北方世界所主持建立的联合国体系,发展中国家就没有提出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一倡议的讲坛。因而,要想使南北关系得到缓和,北方就应部分地放弃对国际制度的支持,这样,南北双方就不再有迎头相撞的战场。

第三点与依附论的结论相同,即南北之间脱离关系。鉴于当前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极度失衡,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脆弱状况,霸权国(美国)发挥领导作用的能力与意愿的降低,北方国家国内宏观和微观经济上所面临的困难,从结构现实主义角度看,双方脱离接触是最有吸引力的一个发展途径。因为发展中国家之间权力的不对称性没有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那么大,因而更容易建立起彼此认可的国际制度。即使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自立不成功,但至少可以避免它们将其不满发泄到北方国家身上。

如果说,克莱斯勒对南北关系的描述与解释,还比较严密与客观的话,那么他提出的缓和南北间紧张关系的三条途径则要主观得多。无需繁复的理论演绎,只要证之于南北关系的现实,就可见其纰漏。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南北间相互隔绝是难以想象的,而且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自给自足到能置身于世界市场之外的地步,他所列举的两个典型例子中国和印度,目前却都以尽快融入世界市场为目标。另外,随着国际间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加强宏观调控的需要不是降低了,而是大大加强了。

五、关于对本书的评价及其他

王缉思先生在评介美国著名国际政治思想家摩根索的名著《国家间政治》时指出:评价一项社会科学理论,褒贬其中一点而

100 ◇ 结构冲突 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 ◇

不及其余,固不可取,仅举出其荦荦大端做一些分析评论,也欠周全,惟有从整体上把握其结构特点,才能较为全面地判定其优劣。⁽⁹⁾ 我们就是以这个态度来评价克莱斯勒的这部著作的。

应当承认,作为一项政治理论,克莱斯勒在本书中所提出的体系是相当完整的。第一,它有自己的方法论:修正结构主义,它将结构主义与国际制度研究结合起来,较为成功地解释了国家间权力分配、国际制度的自主性与国际政治结果三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它有缜密的实证分析:在书中的第二部分,它将该方法具体应用于国际金融机制、多国公司、交通运输和全球共同财富四个个案之中,并作了精细的个案分析。第三,它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南北冲突是结构性的,是自由国际经济秩序与国际经济新秩序两种变位权力目标之争,国际社会必须放弃那种只要发展中国家经济上有所进步,南北问题就会自然而然解决的传统看法,南北问题的解决,国际环境与国内制度改革缺一不可。不管同意他的观点与否,其理论的思辨性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从克莱斯勒的理论体系看,有四个最明显的缺陷。第一,关于基本术语的定义。如在克莱斯勒的研究中,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称谓,就有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南方世界、非工业化国家等不同的术语,而且基本上是混用的,没有专门加以厘定。虽然它们所指的基本范围大致相当,但各有侧重点和特殊的使用背景。关于这一点,我国学者李琮先生对此有更为精确的区分。⁽¹⁰⁾

第二,关于行为体理性的命题。克莱斯勒先验地认为,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像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天然地会根据成本—收益原理从事目标最大化的博弈,行为体内部决策程序的层化因素可以忽略。后来,克莱斯勒将国家理性的命题扩展到了国家集团,即南方世界和北方世界两大集团理性地谋求自身的集团利益。在南北关系的整体框架下,其双方内部的差异,特别是北方世界内部的

差异是可以不予考虑的。而实际上,在对待南北关系的问题上,美国与欧盟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另外,在本书的分析中,似乎只有南方世界与北方世界两个理性行为体间的二元对立,而没有外部环境与内部因素的制约。没法理清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南北关系有多少属于本质内容,有多少属于东西方对立格局折射后的“镜像”。

第三,克莱斯勒忽视了动态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本书的理论起点是国家间的权力分配格局及由其所决定的国际制度、国际关系和其研究对象南北关系,都是在这—结构性背景下展开的。而国家间的权力分配只是一个既定的静态概念,没有考虑到权力这一概念产生的环境和它在内外条件发展中本身所发生的变化。而完整的研究视角,就应该既关注既有的权力分配的静态现实,也要认识到国际关系在长期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本身所产生的量变和质变,尤其要注意各种趋势性因素的作用,如高科技的发展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国际社会的观念与认知方式的变化,行为体通过“学习”获得的“进步”等因素。在当下,要特别注意全球化对南北间原有的生产分工、资源流动方式、双方内部的决策过程以及它们对国际问题的认识等方方面面所产生的影响。

最后,与第一点相联系,克莱斯勒声称本书的分析方法借用了沃尔兹的三层次分析法,但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却过重地强调了第三层次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其美国同行、著名国际政治学家基欧汉所谓的“颠倒的第二种设想”(The Inverted Second Image Problem)在理论上更为周全。⁽²⁰⁾众所周知,沃尔兹关于战争根源三种设想中的第二种设想,强调的是国内政治体制差异对国际冲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所谓国际问题的国内根源,基欧汉则把这种“设想”颠倒过来,既强调跨国力量对国家间政治的影响,同时也强调这种跨国力量是如何以及怎样对国内政治经济产生作用的。而克莱斯

第五部分 结构冲突 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 ◇

勒只强调了单向度的影响 ,没有探讨它们的互动过程。

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 ,克雷斯勒教授曾谆谆告诫年轻的学子们 :“ 不要去赶那些昙花一现的 ‘ 潮流 ’ ,而应努力挖掘真正能经得起经验和时间检验的学术命题 ,即使它们并不会博得一时的喝彩。”^{〔50〕} 这一点他的确做到了 ,也是我们可向克雷斯勒先生所能借鉴的最可宝贵之处。

李小华

2005 年 9 月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

注 释

〔50〕 转引自王逸舟 :《西方国际政治学 :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 页。

〔51〕 转引自王逸舟 :《西方国际政治学 :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 页。

〔52〕 转引自王逸舟 :《西方国际政治学 :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 页。

〔53〕 关于两位学者对此的评价,分别参见 :王逸舟 :《西方国际政治学 :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 页;王逸舟 :《西方国际政治学 :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 页。

〔54〕 转引自罗伯特·吉尔平 :《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 页。

〔55〕 里昂惕夫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赶超,有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第一,发展中国家要在社会、政治和制度三方面进行影响深远的内部变革 ;第二,在世界经济秩序中要进行重大的变革。参见里昂惕夫 :《世界经济的未来》,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第 1 页。

〔56〕 王缉思 :《摩根索理论的现实性与非现实性》,载摩根索 :《国家间政治 :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前言第 1 页。

◇译者序◇ 员猿

(愿) 李琮先生将第三世界定义为：“挣脱殖民统治后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总体。”认为它们与发达国家、南方世界是有区别的。参见李琮：《第三世界论》，世界知识出版社 员愿猿年版，第猿—缘页。

(怨) 砸遭刚成立以来，国际新闻界曾对国际新闻上某些问题产生过不同看法，曾引起争论，但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终于达成了协议。

(员园) 国际新闻界曾对国际新闻上某些问题产生过不同看法，曾引起争论，但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终于达成了协议。

中文版自序

第三世界曾致力于改变金融、贸易、信息流动及其他领域的国际游戏规则,具体表现为提出国际经济新秩序(1974年),但到1985年《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出版时,促使这种尝试的推动力已日渐衰弱。工业化国家已拒绝了七十七国集团(1964年)的许多动议。在1980年代,加强权威性管制的需求几乎完全不合时宜,这些需求与市场导向的国际机制相左,而且仅当面临某些意外的重大事件时它们才偶有复兴,例如,亚洲金融危机致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呼吁控制国际资本流动。自由主义观念和政策已成为主流。南北差距依旧存在,但与先前相比已不再那么突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几乎都参与了类似于凯恩斯农业出口国集团(1955年)的协商组织。

第三世界创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缘何失败?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来自于它们在一些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中的成员身份,这些组织往往以一国一票为原则基础。然而,这种正式的制度性权力终归有其局限性,尽管究竟是哪些局限性这点在1970年代尚不明显。当第三世界提出的议程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要求相去甚远时,拥有经济、技术和军事优势的发达工业化国家便常以终止谈判相威胁,或者干脆拒绝这些倡议。美国也确实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只因该组织支持国际信息新秩

序,而这套提议却与美国经济偏好尤其是意识形态偏好相对立。几个主要发达工业化国家也只是在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进行修订以后才予以签署。此前,有关深海矿床等的条款要求工业化国家的公司与国际海底管理局(国际海底管理局)共享技术,而 20 世纪 80 年代的最终修订案则大大减少了后者的权力。

其次,苏联的解体使得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相对实力增强。尽管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尝试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已过巅峰,社会主义集团的解体还是削弱了第三世界的地位。反共产主义是美国冷战期间许多政策的策动因素。苏联提供了资本主义的替换模式,从而成为美国在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的对手。苏联领导人不断满足第三世界的需要,因为他们有能力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军事、经济和技术资源。只要苏联是主要参与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影响力就会受到限制。美国领导人担心在发展问题上过于强硬的立场会将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推向社会主义阵营。随着苏联的解体,这些限制因素消失了,主要的市场经济工业化国家更不太可能会接受第三世界的要求。西方国家可以更有力地推进其议程而不再担心发展中国家会走向另一边,因为可倒向的另一方已不复存在。

再者,部分第三世界国家迅速发展的实践表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意识形态支柱——依附论并不正确。该理论的核心论点是,第三世界国家陷入了先天具有剥削性的全球经济体系。原材料贸易条件日益恶化,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活动则基本为核心经济体所垄断,消费者的偏好亦为跨国公司所支配。南方的赤贫化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后果之一,而不是由穷国所谓教育水平低或资本不足等国内政治或经济因素所致。依附论的政策推论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脱离全球资本主义,否则将会在贫穷中越陷越深。

员远◇结构冲突 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

一些发展中国家举世瞩目的成就也证明了依附论的错误。许多东亚国家或地区,尤其是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韩国,其惊人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工业化国家在 19 世纪类似阶段的水平。近年来,中国经济也经历了高增长。但与此同时,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许多非洲国家——却一蹶不振。依附论无法解释为什么部分发展中国家飞速发展而其他国家却步伐缓慢甚或退步。1960 年代,所有这些国家都明显处于边缘地带,但到 1980 年代时其中部分国家则已跨入最繁荣国家的行列。作为 1960 年代早期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韩国在 1980 年代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合作组织(经合组织)成员,而国内政治和经济结构截然不同的朝鲜却衰败了。新加坡 1980 年人均收入要高于美国。1980 年代的经济充分表明,世界经济体系并不构成经济发展的障碍,国内政治与经济状况才是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最后,还有另一因素可解释第三世界已不太热衷于支持更具权威性的管制,这种管制与市场导向的国际机制相对立;同样,它也可解释与专制政治体制相对立的民主体制的日益增加。《结构冲突 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强调发展中国家政治体制的脆弱性,并以此来解释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要支持他们在其中拥有更多控制权的国际机制。1980 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政治结构不仅难以适应外部经济变化,而且具有独裁性。或多或少,专制领导人人都为控制国内经济行为而大伤脑筋,但若不调整国际参与最终也就无法控制国内的经济行为。在民主体制中,政治领导人也会担心外部经济压力,但就直接控制物质资源在本政府组织之内的分配而言,其与独裁领导人所受的束缚有所不同。在目前的环境中,一些市场自由化的最顽固抵制者已是寻租的政治领导人,他们在国内的政治支持率(或可称为政治合法性)取决于其通过介入市场甚至以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为代价获得的国家收入。民主

◇ 中文版自序 ◇ 苑

国家的领导人同样担心挑剔的选民,可是其选举的获胜还要视经济运行的整体情况而定,并且过去十年成功的经济运行也已离不开市场开放措施。

然而,自由主义和开放市场在目前的胜利并不可据以推测将来的发展。即便对民主国家而言,也只有在具有稳定的国内支持基础时,市场自由化才会成为可能。政府必须提供安全网,也必须致力于缓和外部打击。在过去的十年里,世界的许多地方都经历了强劲的增长(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显然除外),这部分要归因于快速技术革新的影响。实行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运行良好。即使亚洲经济危机也未留下永久的伤痕,这场危机可是严重卷入市场驱动的全球经济所带来的危险性的一典型例证。但是,若增长势头转弱或者外部打击更加严重,无论民主领导人还是专制领导人都将被迫寻求减缓外压的途径。作为国际经济新秩序部分内容的一些倡议或许会得以新生。

斯蒂芬·阅·克莱斯勒

一九九四年 苑月于加州斯坦福